

第二章 蔡元培的生平與思想

本章有關蔡元培的生平與思想，依研究需要，詳分為：第一節 蔡元培的生平背景，說明蔡元培的生平行誼與第二節 蔡元培的思想內涵，紹述蔡元培的思想淵源與特質，及第三節本章結語，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蔡元培的生平背景

本節敘言蔡元培的生平背景，約可細分為：一、幼年生活及早年求學過程；二、蔡元培早期的工作經驗。研究者期望能在幼年生活及早期的工作經驗中，或可見及蔡氏在體育思想之節端。

壹、幼年生活及早年求學過程

一、蔡元培的幼年生活：

蔡氏以明季自諸暨遷山陰，其初以藝山售薪為業，至子民之高祖以下，始為商。子民之祖名嘉謨，字佳木，為典經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為錢莊經理，以長厚稱，家中人至以「愛無差等」笑之。子民之母周氏，賢而能。以1867年（民國前44年）1月11日（即清同治6年12月17日）生子民。方子民喪父時，僅11歲，有一兄，13歲；又有一弟，9歲。其貸素寬於處友，有貸必應，欠者

不忍索，故歿後幾無積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贍其遺孤者，周氏不肯承認。質衣師，克勤克儉，撫諸兒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賴」勉之。常自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豫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債事。」故子民之寬厚，為其父之遺傳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焉（註1）。

二、早年的求學過程：

子民有叔父，名銘恩，字茗珊，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下頗盛。亦治詩古文辭，藏書亦不少。子民10餘歲，即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子民自13歲以後，受業於同縣王子莊君。王君名懋脩，亦以工制藝名。而好談明季掌故，尤服膺劉蕺山先生，自號其齋曰仰蕺山房。故子民20歲以前，最崇拜宋儒。

子民以17歲補諸生，自此不治舉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為駢體文，偶於書院中為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院長錢振常、王繼香諸君轉以是賞之。其於鄉會試，所作亦然。蓋其好奇而淡於祿利如此。然己丑庚、寅鄉會試聯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在子民亦自以為出於意外云。子民20歲，讀書於同鄉徐氏，兼為校所刻書。徐

氏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子民之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為戰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蓋其尚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

丁未，孫慕韓君任駐德公使，允每月助子民以學費 30 兩。又商務印書館亦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子民於是偕孫君赴柏林。在柏林 1 年，習德語外，並編書，又由孫君介紹，以國文授唐氏子弟 4 人（每月得脩德幣百馬克）。第 2 年，遷居來比錫，進大學聽講，凡 3 年。於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之講義，凡時間不衝突者，皆聽之，尤注重於實驗心理學及美學。

1912 年（民國元年）夏，子民既辭職，秋，遂偕眷屬再赴德國，仍至來比錫，仍在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1913 年（民國 2 年）夏，得上海電，以宋案促歸國，遂歸。奔走調停，亦無效果，卒有贛寧之戰。是年秋，子民復偕眷屬赴法國，住巴黎近郊 1 年。歐戰開始，遂遷居法國西南境，於習法語外，編書，且助李石曾、汪精衛諸君，辦理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

綜依上述，由此可見蔡氏早年接受傳統舊學的教育，承繼了中國傳統的思想，自一 1895 年之後才開始接受西方教育的洗禮，1907 年後，更兩度赴歐遊學。由此可見，蔡氏早年兼續了我國傳統強兵強種

的體育思想，故有倡導軍國民體育教育之實，後經涉獵西學，再加留學歐洲，使蔡氏後期的體育思想，由軍國民體育教育轉型至現代的自然體育思想。

貳、蔡元培早期的工作經驗

一、擔任京職之工作經驗：

蔡氏 24 歲，被聘為上虞縣志局總纂。因所定條例，為分纂所反對，即辭職。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因見康有為百日維新失敗，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取代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云（註 2）。

二、擔任學堂教職及參加革命之工作經驗：

是時紹興紳士徐君方經營一中學校，名曰紹興中西學堂。徐君自為堂董，而薦子民為監督。校中有英、法兩外國語，然無關於思想。子民與教員馬用錫君、杜亞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馬君教授文辭，提倡民權女權。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均不免與舊思想衝突。教員中稍舊者，日與辯論，子民常右新派。舊者恨之，訴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諭送學堂，屬子民恭書而懸諸禮堂。子民憤而辭職（註 3）。

南洋公學退學事件，論者謂為子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子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謀自立學校，乃由子民為介紹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沿女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以子民為代表，請吳稚暉君、章太炎君等為教員。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為酬，於是蘇報館遂為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

吳君又發起張園演說會，倡言革命。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亦來學社，章行嚴君其一也。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子民亦剪髮，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無何，留日學生為東三省俄兵不撤事，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是時，愛國學社幾為國內惟一之革命機關也。

辛亥，武昌起義，子民受柏林同學之招，赴柏林助為鼓吹。未幾回國，於同盟、光復兩會間，頗盡調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總長。宣布「蔡子民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謂「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子民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而願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子民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揭櫫之自由、平等、博愛

為綱，而以古義證明之。謂「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博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三、擔任北大校長之工作經驗：

1916年（民國5年）5年秋，子民在法，得教育部電，促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遂於冬間回國。1917年（民國6年）1月，始任事於北京大學。並延積學之教授，提倡研究學問之興會。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以供正當之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講演團等，及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註4）。

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驗」中說：「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20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當1918年（民國7年）夏，北大學生與他校學生為外交問題而結隊遊行，先生曾力阻他們；到了1919年（民國8年）五四運動，先生也就不再阻止他們了。當時各校學生都有，但北大獨居多數。

顧孟餘在「憶子民先生」一書中說：「先生長北大數年，以政治

環境關係，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照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制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信賴校長，此制度不易推行也。」這種民主主義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國教育史上真是創舉。因為先生篤信民主主義，並受德國學制影響，所以不但能提倡，而且使之實現，能夠得到圓滿的結果。到了1922年（民國11年），蔡氏發表教育獨立議，亦主張教授治校，校長公舉。

蔡尚思綜言：蔡氏在教育方面的思想與事業可析分如下：

（一）就階段來說：

- 1.在滿清政府時代，創立並主持號稱「第一革命團體」的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愛國女學，為中國最早致力於新教育者。
- 2.在臨時政府時代，為首任教育總長，奠下民國教育基礎。在北洋政府時代，長國立北京大學，多所改革，大開風氣，為中國自有大學以來最有成績最有影響的大學校長，同時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化運動思想革命的助成者。
- 3.在國民政府時代，為首任大學院長即教育部長，增設藝術院校，並創辦主持國立中央研究院，致力於科學與美育的事業；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在科學方面對於國家很有貢獻。

(二) 就部門來說：

則自家庭教育至社會教育，自普通教育至高等教育，以及留外教育，女子教育，軍事教育，教育宗旨，教育行政，教育經費，教育團體，學校系統，學校管理，教育方法等等，方面之多，範圍之廣，材料之富，見解之新，有史以來，所未曾有（註5）。

北京大學在蔡氏未任校長以前，學生對於學術並沒有興會，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蔡氏到了北大，才對症下藥的加以整頓，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並提倡進德會，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與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游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提倡課外的高尚娛樂與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

依「吾師蔡子民先生哀悼辭」中，黃炎培敘明蔡元培的教學法可歸納為：第一是智育體育並重的；第二是課本與參考書，或課堂與圖書館並重的；第三是讀書與寫作並重的；第四是授課與接談並重的；第五是注重個別指導，發展個性的；第六是寓愛國或革命於教育的；第七對於外國文注重閱讀而不注重會話，是以求世界知識學問為目的；現今一般學外國文的，尤其是一般教會學校便反而注重會話而不

注重閱讀，是以交際應酬或求職業做買辦……為目的的。所以前者能看外國高深書，而不能說外國普通話；後者長於說外國普通話，而短於看外國高深書。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第八是注重演講討論；但演講卻是蔡氏所短的。第九是先生涉獵的廣博，知道各種學問的互相關聯；第十是蔡氏最富有「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實不愧為一位模範教師。

王世杰更述其逝世以後的窮困道：「蔡先生的私生活，用不著多說，即就清廉一端而言，他已經是中國歷史上的模範人格。……有一位朋友自香港回重慶，向我說：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餘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裡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註6）。

在工作經驗階段，初由為官，後見政體紛亂，體悟若要變革成功，必先培孕革新人才，而人才的養成非靠教育不可，故而拋去官職，全力投注於教育，並倡言革命。

投注教育期間，非常重視兵式體操，也親自參與，奠定民初為教育總長時倡議之軍國民體育教育之基礎。

後因遊學歐美，受歐美現代體育思潮兼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任北京大學時，極力倡成體育會等體育推行組織，推行現代體育。

第二節 蔡元培的思想內涵

凡論思想的內涵及於其形成的數方面因素，本研究在蔡元培的思想內涵部分內，廣續前節蔡氏之生平背景及其學習與工作經驗方面，形成之體育思想特質，分別就軍國民體育與美感體育思想形成之背景與歷史二方面加以論述。

壹、蔡元培體育思想之特質：

徐元民於「民初學校體育決策者—蔡元培的體育思想」乙文中，指出：蔡元培的體育思想具有二種特質，並具體呈現於民初的學校體育政策之中，一是具德育基礎的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另一為具德育基礎的美感教育體育思想，前者因襲了晚清的舊制，以高等小學以上的男學生為對象，施以兵式體操及普通體操教材，以達自衛衛國的目標；後者則取法於西洋的思潮，以各級學校男女學生為對象，透過遊戲、普通體操、課外運動等教材，以達涵養身心、鍛鍊體魄的目標（註7）。

一、軍國民體育之緣起：

許義雄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形成」一文中，指出近代體育思想成因於：清末的洋務與維新運動的求富與求強，使西藝西政甚囂塵上，兵式體操在各學堂應運而生，而主張「保國」、「保教」、

「保種」的觀念也普遍展開。1912年（民國1年），列強交相進逼，歐戰暴發，社會動盪不安，政局不穩，以尚武立國，傳授固有武術，軍國民仍為教育主流，促使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發展。由於求生存、求富、求強的思潮之下，加上歸國學人日多，中國體育在逐步邁向近代化過程中，亦遭遇「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衝突，「新」、「舊」的掙扎，以及「洋」、「土」的矛盾及取捨上，有一段相當漫長而艱苦的踟躕過程（註8）。

洋務運動最早接觸並引進西方近代體育。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國，每年30人，共四批120人，均為幼童留學生。他們畢業後將英美體育帶回中國。1876年李鴻章曾選送下級軍官七人赴德學習陸軍，1879年回國後，以德國兵操教練李鴻章的新軍。1896年張之洞練洋操隊二營於湖北，轟士成於直隸淮軍內選練馬兵隊三十營，仿德國營制操法。1897年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所練之新軍，名叫「自強新軍」，不但請德國人教練，而且聘德國人來春石泰任統帶（註9）。洋務運動主要目的在引進洋槍洋炮之武器為，但也將西洋兵式體操帶進軍隊中。

德國與日本等國因軍國民教育而興，軍國民教育足以強民、強兵、強國的功能得到證實，西式體操因而被認為能強民、強兵而備受重視，導致體育發展也步入軍事化之途。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因而興

起，主導了中國近代體育的發展。

二、美感體育之緣起：

蔡元培指出：美術的起源始於舞蹈，各民族初期的舞蹈分體操與唱戲二類（註10）；兒童六歲進入學校之後，此後十一、二年的普通教育時期，專屬美育的課程，有音樂、圖畫、運動、文學等（註11）；蔡氏對美育闡釋有曰：「美育具有普通性以打破人我之界限，又有超脫性以透出利害的關係，所以當著重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甚且有殺生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害人的勇敢。」（註12）

由於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過於先進，民國初期雖能納入教育宗旨之範疇，惟附和者尚不多見，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始獲得一般認同；這種超脫於肉體之外的美育思想，蔡氏仍將其規範於道德教育之下，因此，蔡氏於長北京大學期間，對於具有德育基礎的體育思想，表露尤深。

綜合言之，蔡元培具德育基礎的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具有承先啟後之階段性任務，其影響之深，持續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另一具德育基礎的美感教育體育思想，也於五四運動之後獲得重視。

貳、我國軍國民體育與美感體育思想形成之歷史背景

思想的形成有其時代意義，而軍國民體育及美感體育思想的形成淵源於其時代背景，乃時勢所趨、順天應人，而蔡氏正將在此一時代，當深受影響。

一、我國軍國民體育形成之歷史背景及對蔡氏之影響

蔡元培因滿清政府的無能，主張革命排滿，但非歷史上的種族仇恨，於所創辦《俄事警聞報》中，倡議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之策，並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註13）；也因此，蔡氏主張強兵富國，必須透過軍國民教育及實利教育，以自衛衛國，提昇國家實力（註14）。

由於1842年（道光22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喪失的主權有領土權、司法權、經濟權和教育權，是以，朝野人士為保衛國家主權，乃興起了近代民族主義思想（註15）；蔡元培於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幕演說中，對教育宗旨之說明，明確的指出軍國民主義乃應時勢之需要（註16），他於「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對何以採用「軍國民教育」之主張有所說明，他說：「我國強鄰交逼，亟圖自衛，歷年所喪失之國權，非憑藉武力，勢難恢復，軍人革命之後，難保無軍人執政之一時期，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將使軍人社會，永為全國中特別之階級，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則如所謂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也。」（註17）。

可見，蔡元培已體認出國家受列強的凌辱，國權的喪失，需藉武力以為後盾，又因國內軍閥猶存，預存危機意識，因此，主張強兵自衛，強調尚武以備不時之需，在此歷史背景及當時情局之下，成為蔡氏的體育思想淵源之一。

二、我國美感體育思想形成之歷史背景

蔡元培於「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中謂：「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因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而蔡氏對美育有道德、公民等情操培養，亦即蔡氏體育之美育運緒在情操，此對後世體育影響深遠。今人常見電視廣告，常以運動之情操多打動收視者為訴求，可見其影響之一斑。此乃蔡元培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而願出全力以提倡美育體育之緣由。

參、蔡元培軍國民體育與美感教育體育之思想內涵

在蔡元培軍國民體育與美感教育體育之思想內涵的探討方面，分別探討軍國民體育思想內涵、美感教育體育之思想內涵，並從關係教育知識、道德、宗教實體、社會時代……等方面加以闡釋。

一、軍國民體育思想內涵：

清末民初是為我國國力最弱之時期，蔡元培認為不應長期處於弱肉強食的困境，而欲有所突破，不應等閒視之。

蔡元培於「勿畏強而侮弱」一文中指出：「蓋我之畏強，以為我弱於彼，不敢與之平等也，則見有弱於我者，自然以彼為不敢與我平等而侮之，又我之侮弱，以為我強於彼，不必與彼平等也，則見有強於我者，自然以彼為不必與我平等而畏之。」（註18）。

蔡氏另於「愛護弱者」一文中指出：「吾人對於弱者，無論何時，常有惻然不安之感想，蓋人類心理，以平為安，見有弱於我者，輒感天然之不平，而欲以人力平之，損有餘以益不足，此即愛護弱者之原理也。」（註19）。

民初軍國民教育思想共有二起，一在宣統末年至民國初年之間，一於民國四、五年之間，由於清末軍國民教育呼聲極高，民國肇造之後，蔡元培以潮流所趨，難於抹煞，乃賡續晚清之思潮，卻非蔡氏所創始（註20）；蔡氏指出：採用軍國民主義的原因乃應時勢之需要（註21）。

然而，蔡元培提倡軍國民教育，以道德為根本，其用意在於戢止私鬥，防止對外侵略，而確保國家獨立與和平（註22）；蔡氏認為實施軍國民教育須以道德教育為其基礎，否則將誤入歧途，引發兵戎之災（註23）。

基於上述，可知蔡元培具德育基礎的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之內涵，主要源自於強兵自衛的需要，力挽國力之思維，並因應舊制與輿論之反應。惟最大之特點，在於並非以征服他人為目的的軍國民體育教育。

二、美感體育之思想內涵：

蔡元培提出的「五育」並舉的教育，就是德、智、體、美和諧發展的教育，辛亥革命後，蔡氏認為革命目的已達，以後的任務就是建設國家，養成共和國民健全的人格（註24）；且認為遊戲屬美育，普通體操則兼美育與軍國民主義，可見蔡氏的美感教育與體育思想具有關連性。

蔡元培對於美學的作用與價值，約可歸納如下列：

（一）美學與教育知識方面之關係：

蔡元培曰：「教育者則立於現象世界，而有事於實體者也。」而美育主義，正是「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

（二）美學與道德方面之關係：

蔡元培說：「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我之見，利己損人之思念，以漸消沮者也。」

（三）美學與宗教實體方面之關係：

蔡元培以為：「美術可以輔宗教之不足，並且只有長處而沒有短處。」這是說離開美術，便不成為宗教了。

(四) 蔡元培對第一次大戰，也用美術的眼光去解釋道：「德法二國所以能持久之原因，……第一因科學之發達，第二因美術之發達。」

(五) 美學與社會時代方面之關係：

如蔡元培：「初民美術的開始，差不多都含有一種實際上目的：尤如家族的徽誌，平和會的歌舞，與社會結合，有重要的關係。」

(六) 美學與勞動工作方面之關係：

如蔡元培說：「文明時代，分工的結果，不是美術專家，幾乎沒有兼營美術的餘地。」

(七) 美學與科學概念方面之關係：

蔡氏以為：「科學基於概念，美術偏於直觀。成人生活，關係複雜，聯綴種種概念以應付之；積久而感疲勞，則有資於直觀之美，以為調劑。」

(八) 美學與文學興趣方面之關係：

蔡元培說：「譬如一個文學家，他終身埋在文學裡面，旁人看他所工作的，似乎很苦惱；然而他終是不停的工作，這便是得到一種藝術的興趣。」

總之，在蔡氏看來，美學與人生社會任何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

(註 25)。

由於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過於先進，民國初期雖能納入教育宗旨之範疇，惟附和者尚不多見，直至民國 8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始獲一般認同；這種超脫於肉體之外的美育思想，蔡氏仍將其規範於道德教育之下，因此，蔡氏於掌北京大學期間，對具有德育基礎的體育思想，表露尤深（註 26）。

肆、蔡元培體育思想對我國近代體育的影響

蔡元培體育思想可謂為順應世界潮流，對我國近代體育的影響甚鉅，不僅為日後體育推展奠基，其所提倡的體育教育主張，並激起國人對傳統體育的反思，予今人以培養多元學習精神的指標。

一、美感教育體育思想取代軍國民體育思想，契合世界潮流：

蔡元培於「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指出：「民國 5 年冬，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註 27），而第一個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伏首案前，孜孜苦讀，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痛苦，應從事正當之娛樂，庶於道德無虧，而於身體有益（註 28）」；蔡氏另於北京大學進德會之旨趣書中，指出為改善不良風氣，遏止嫖、賭、娶妾等，乃輔導創辦進德會，並組織各種團體，藉以導正風

氣，其中體育會、書畫研究會均屬之；可見，體育在蔡氏的眼中，視其為導正學生不良風氣，修習個人德行的手段之一（註29）。

1919年（民國8年），發生以北京大學為首的五四運動，蔡元培於「去年5月4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乙文中，勉勵學生界勿以自殺的罷課政策，而應專心增進學識、修養道德、鍛鍊身體，如有餘暇，可服務社會，將來為國家解決更大的問題（註30）；另於北京大學22週年開學式之演說詞中有謂：大學不是販賣文憑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研究學理需有活潑的精神，所以提倡體育會、音樂會、書畫研究會等，以涵養心靈（註31）；由此可知，蔡氏將體育融入學校教育的一部分，且有助於身心的涵養，及教育的平衡。

他體察當前之所需，認為今後教育宗旨應具備五項：

- （一）軍國民教育。
- （二）實利主義教育。
- （三）公民道德教育。
- （四）世界觀教育。
- （五）美感教育。

前三者為隸屬政治者，以教育為達成政治目的之工具，後二者為超軼乎政治者，以教育為完成最高理想而不受現實政治的拘束。其中尤以超軼乎政治者為可貴，實開吾國教育之新紀元。他認為當時教育

界所提倡的軍國主義和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需，但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這五項係據光緒 32 年 3 月 1 日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等五項教育宗旨而加以修正，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略同，只是範圍或不免有廣狹之異；至第四、第五兩項則為彼所不道，而為蔡元培所特別注意。此外，他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刪去（註 32）。其所以採用這五項為今後教育之方針，確曾經過多方面的考量，此雖為其個人的看法，但此後他對教育的主張，多半是照著上述宗旨發展的。

綜合以上引述，可得知蔡元培具德育基礎的美感教育體育思想，期能導正不良風氣，涵養個人德行，培養身心合一的健全人格，並將其融入現代體育教育的思潮之中。

二、提倡軍國民教育思想，激起對傳統國粹體育的反思：

1862 年清末新教育開端至 1919 年五四運動為止，中國近代體育，隨著國勢與教育的發展逐步演進，其肇始首由兵操開其端。1928 年南京國術研究館改組為中央國術館，之後各省市國術館相繼建立，其目的在復興中華武術，強種救國，振興民主。此軍國民體育的引入，

激起國人對傳統國粹體育的反思。

此時的體育，不論是遊戲、普通體操、運動會，或兵式體操，均列為尚武的內容，達成軍事目標的手段之一，顯示出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於民元教育宗旨公布之後，仍持續的發展，無疑受蔡元培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所影響，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因此，蔡氏的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為形成「體育軍事化思想」的重要過程（註33）。

三、提倡美感教育體育為今後全民體育發展的基礎：

蔡元培於民前赴歐遊學，主攻美感教育，因此，於民元掌教育部時，對美感教育甚為重視，但憾未獲得共鳴。蔡氏任教育總長不及一年，再度赴歐進修。1916年受召返國掌北京大學，仍舊堅持其美感教育理念，並將體育視為達到美感教育的內容之一。蔡氏的美感教育體育思想係以德育為基礎，以涵養身心鍛鍊體魄為目標，該思想直至1919年五四運動後，方為各界所接受，是為先知先覺之領導者。

賈豐臻於「今後之教育界」一文，針對五四運動發生後，提出較為持平的觀點，呼籲行政界、立法界、工商界、以及學校當局等，均應檢討反省整個教育制度與教育理念，在體育方面，指出應注重衛生常識及身體的鍛鍊，並配合訓育的功能（註34）。1919年（民國8年）教育調查會曾提出教育宗旨研究案，擬定「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為宗旨，並指出自歐戰結束後，軍國民教育一項已不符世界

潮流，因此建議刪除，所謂「健全人格」之條件有四：一、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技能；三、強健活潑之體格；四、優美和樂之感情（註35）。

可見蔡元培的美感教育體育思想頗具先見之明，為「體育教育化思想」的先驅，民元雖納入教育宗旨的範疇，卻未能獲得各界的重視。然而，時勢所趨者，終於五四運動後獲得認同。

四、從美感教育體育中培養多元學習精神：

蔡元培強調美感教育體育，要能與教育知識、道德、宗教、社會、勞動、科學、文學等相結合，達到多元學習目標，有助於個人潛能的發展，達到身心皆臻健全之境界。

蔡氏於清末民初先後三次赴歐進修，計達十年之久，尤以美學的體認造詣頗深，就當時而言，仍少有攻讀該項領域者，故雖於民元任教育部長時，堅持將美感教育思想融入教育宗旨之中，惟此一思想並未獲得共鳴，多為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的氣勢所掩，直至五四運動之後，始獲得重視。

第三節 本章結語

經由以上相關資料研探，有關蔡元培之生平背景及思想內涵，予以歸納如后：

蔡元培一生，經歷清末民初之不同體制的朝代，未接觸西方思想以前，應屬舊學時代，具有中國傳統之思想，俟涉獵西洋文化之後，而具有中、西兩種文化之思想。中年期間為赴歐遊學時期。後任北京大學校長。適時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外加軍閥割據，政局紛亂不已，但是蔡氏一秉以往抱持著積極忠純的態度，以前瞻的洞見，走在時代的尖端，是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承先啟後的人物。

南京政府成立，就任教育總長一職，提倡其教育理念，尤以科學、美育為重，奠下民國教育之基礎。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眾多改革於建立新制度與諸多創舉，使北大校風為之氣象一新。

蔡元培的思想內涵，主要可分為軍國民體育與美感體育兩大方面。在教育宗旨中，明確指出軍國民主義在歷史背景及當時情局之下，乃應時勢之需。故軍國民教育體育，於焉成為其體育思想內涵與淵源之一。而美感體育方面，蔡元培認為軍國民主義，因為救國之必要，但需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而要有此一涵養，非注重美育不可。此乃蔡元培受留德所學之影響，而願出全力以提倡美育體育之緣由。

蔡氏的體育思想對我國近代體育的影響約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 (一) 蔡氏以美感體育思想結合現代體育教育思想，契合世界潮流。
- (二) 提倡軍國民教育思想，激起對傳統國粹體育的反思。
- (三) 提倡美感教育為今後全民體育發展的基礎。
- (四) 倡議由美感教育體育中培養多元學習的精神。

附註

註1：蔡尚思 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 臺北 蒲公英出版 1986年

97-217頁。

註2：同註1。

註3：同註1。

註4：高叔平 蔡子民先生傳略 重慶 商務印書館 1943年

172-173頁。

註5：同註1。

註6：王世杰 追憶蔡先生 引自蔡尚思 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

臺北 蒲公英出版 1986年 94頁。

註7：徐元民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 臺北 師大書

苑 1999年 63-92頁。

註8：許義雄 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之形成 體育學報第9輯 臺

北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1987年 1-6頁。

註9：谷世權 中國體育史下冊 北京 北京體育學校 1943

年 38-40頁。

註10：蔡元培 美術的進化 東方雜誌第3期第2號 上海 商務

印書館 1920年 128-130頁。

註11：蔡元培 美育的實施方法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年 52-56頁。

註12:蔡元培 美育與人生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86年 57-58頁。

註13:陶英惠 辛亥革命前後的蔡元培 傳記文學雜誌第38卷第3期 臺北 傳記文學雜誌社 1981年 10-16頁。

註14:蔡元培 我一撰之臨時教育會日記一文 教育雜誌第4卷第6號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12年 1-4頁。

註15:瞿立鶴 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教育思潮 北京 中央文物供應社 1984年 2-4頁。

註16:同註14。

註17:蔡元培 對於新教育之意見 東方雜誌第8卷第10號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12年 7-11頁。

註18:蔡元培 勿畏強而侮弱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年 71頁。

註19:蔡元培 愛護弱者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年 72頁。

註20:陳青之 中國教育史 臺灣 商務印書館 1966年 649頁。

註21:蔡元培 我一撰之臨時教育會議日記一文 教育雜誌 第4卷 第6號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12年 1-4頁。

- 註 22：鄭世興 蔡元培 近代中外教育思想家 臺灣 臺灣省教育廳 1967 年 279-308 頁。
- 註 23：蔡元培 我一撰之臨時教育會議日記一文 教育雜誌第 4 卷第 6 號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12 年 2 頁。
- 註 24：郭齊家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錄於中國教育思想史 臺北 五南圖書公司 1987 年 419-425 頁。
- 註 25：蔡尚思 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 臺北 蒲公英出版 1986 年 321-325 頁。
- 註 26：徐元民 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 臺北 師大書苑 1999 年 65-83 頁。
- 註 27：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1 號 上海 商務印書館 1934 年 5-13 頁。
- 註 28：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詞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 年 134-135 頁。
- 註 29：蔡元培 北京大學進德會之旨趣書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 年 348-351 頁。
- 註 30：蔡元培 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後的希望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 年 352-353 頁。
- 註 31：蔡元培 北京大學二十二週年開學式之演說詞 蔡元培全集

臺南 王家出版社 1968年 193-194頁。

註32：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蔡元培全集 高叔平編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 246頁。

註33：同註26。

註34：賈豐臻 今後之教育界 教育雜誌第11卷第8號 上海 商
務印書館 1919年 1-8頁。

註35：教育部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南京 教育部 1934年。

第三章 蔡元培對我國近代體育的推展

本研究在探討蔡元培對我國近代體育的推展，分為第一節 時代背景、第二節 對我國近代學校體育的推展、第三節 對我國近代社會體育的推展三個部分加以分析，以更了解蔡元培對近代體育推展的貢獻。

第一節 時代背景

對於任何事務的推展，時代背景的變數具有關鍵性且不能忽視的地位，故不可不加探討。在對我國近代體育的推展之時代背景方面，首先探討時局的動盪與體育，再之則為經濟蕭條及社會變遷、教育宗旨、文化的輸入、教會學校的澎湖發展……等與體育之間的關係，茲將其分析如后：

壹、時局的動盪與體育

當時之時局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以後，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潮高漲，特別是亞洲地區。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主張如保障弱小國的獨立、民族自決、廢除秘密外交等原則，中國知識份子莫不深加擁護，並對戰後遠景寄予無限希望。歐洲新興的政治潮流，如民主共和國的增加，民權的擴大，工業民主等，也增強國人的未來希望。

可是巴黎和會上，列強重建殖民政策的野心暴露無遺，凡爾賽和約竟規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中國受害最深，驅使國人由無限希望急轉而陷入極端失望與悲憤，愛國情緒遂如火如荼的蔓延伸張。另一方面，蘇俄、土耳其在這期間內，紛紛爆發革命運動，這些都影響中國知識份子採取積極的動作（註1）。

孫中山先生為顧全大局，而在中國方面，於1912年2月，有條件讓位於袁世凱，為防袁氏違紀亂政，建議參議院制定「臨時約法」，改總統制為內閣制。迨清帝退位，孫中山先生於2月13日向參議院提出辭呈，推薦袁世凱以自代，並附辦法三條。經參議院同意，派蔡元培等為代表，北上迎請袁氏南下就職，惟袁世凱以北方形勢未定，未克南下就職，3月8日遂在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註2）。由此可知適時蔡元培受國家之倚重。

清末道光以後，列強交相進逼，內亂頻仍，國勢日危，謀國者變法圖強，莫不以養成自衛衛國能力、發揚民族精神、培育民族意識、陶鑄民族文化以求濟弱圖強，脫離帝國列強的壓迫，建立獨立、自主之國家為首要。

就中國近代體育的推展而言，自清末引進西方體育後，及至納為學校正式課程，並加以全力推展的過程中，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也莫不受著民族主義思想的左右，而有不同的興衰，迎拒及起落的現

象。從單向抄襲模仿，過渡到吸納轉化為新舊並存及中西共榮的局面，實有其艱辛的歷程（註3）。

就中國近代體育思想脈動而言，一方面受國家情勢及社會環境的制約，常在民族主義教育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因體育的特殊功能，也常在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諸多施策中肩負其特殊的使命。具體言之，中國近代體育，除作為教育課程的一部分，達成個人身心均衡發展的教育目的外，常因不同的歷史背景及社會條件，而擔負諸如自衛衛國、培養民族意識、民族情操、民族精神及養成軍事技能的任務。

研究發現，清末民初軍國民教育之體育思想，係以兵式體操、嚴格的體育訓練為媒介，提倡尚武精神，達成保種、保國之目的。就其形成背景而言，當以內憂外患，舉國上下相率提倡全民皆兵思潮所由致之。

當然，影響所及，造成體育概念與目標之模糊不清，兵式體操之強調，軍人之充任體育老師，以及方法之軍事化，社會體育會之相繼成立等，無一不是軍國民教育實施後的具體結果。

基於以上的分析不難了解，中國傳統民族思想，國家的主權意識，以及西方民族思潮的引進與傳導，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影響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之形成，而表現在體育思想上的特質，則有自衛

衛國的體育思想，國粹主義的體育思想，以及國魂教育的體育思想。進一步言之，自衛衛國的體育思想，可以軍國民教育之體育思想為代表，國粹主義體育思想，則為國家主義體育思想的具體表現，而國魂教育體育思想，則可說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體育思想。

不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雖因不同的時間而有各異其趣的表現方式，卻類皆以富國強兵，雪恥復國，培養民族意識，激發民族精神為首重，則無不同。顯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是一種自衛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民族主義及主權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應是極其自然的歸結。

自衛衛國的體育思想，就時間而言，係指 1895 年甲午戰爭起至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的約四分之一世紀的期間。就社會背景看，正處清末民初巨大變革的時代。就體育思想的特質說，則是軍國民教育的實施，培養民族體力的保種論，及尚武救國精神的加強。

1904 年，日俄戰爭，日本以蕞爾小島，竟一舉獲勝，引起中國仁人志士咸認：「日本崛起東方，乃以彼所謂武士道者誇炫於宇內」。從而使國內「識時之士，漸知拳術之為國魂」（註 4），是以或以尚武救國觀點，重新重視武術的推展；或以保種保國的角度，提倡繼承和發展武術的要求。因此，一向被看成是「刁頑之民」所為的武術，甚至曾列為「邪教異端」而嚴加禁止的武術，又再度受到垂青（註 5）。

以致於「兵操廢存」、「新、舊體育」之爭論，乃時有所聞。

再就歷史的條件看，中國近代體育在連年烽火中成長，自始即無法擺脫軍操訓練，尚武救國的框架，一方面主政者迫於現實的需要，不得不採取急功近利的策略，這一現象，可從清末張之洞的學堂章程（註6）、康有為「萬木草堂」的課程（註7）、以及梁啟超的「新民說」（註8）看出端倪，也可從蔡元培的「體育就是軍國民教育」的諫論略知一二，甚至袁世凱稱帝後，以「國何以強，強於民；民何以強，強於民之身；民之身何以強，強於尚武」（註9）之教育要旨中，則更是最具體的說明。這對中國近代體育思想的形成而言，或許只能說是歷史的無奈。

眾所週知，中國近代體育的發展，迭經波折，先是「師夷制夷」的策略，繼之教育主事者專注軍國民教育，體育始終扮演兵操或軍隊操練的角色（註10）。及至1919年歐戰結束後，主張軍國主義的德國慘敗，共和思想興起，朝野望治心切；同時杜威（Dewey）訪華，平民思想及實用主義接踵而至，加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自由思想奔放，「民主」與「科學」呼聲風起雲湧，合理主義抬頭，相形之下，專制的軍國民教育思想頓呈頹勢，枯燥單調的兵式體操終於難逃衰落結局（註11）。

1918年11月11日歐戰結束，翌年元月巴黎和會，中國代表王

正廷、顧維鈞與會，要求廢除中日間種種密約而未果。1919年5月4日北大等13所大學生高舉「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口號罷課遊行，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飽受壓力，在學生集體行動，力保蔡元培的大原則下，政府讓步，6月10日將曹、陸、章免職，7月22日罷課停止，五四運動學生愛國運動至此告一段落（註12）。

總之，民國成立，為配合共和政體，雖然政府的組織不斷變革，但民主制度的雛形略已粗具，民國以後無論採取總統制或內閣制或其他制度，都有「約法」、「國會」或類似的組織為之制衡，在此體制下，政府的權力已有節制，人民的意見略可表達，政府的效能理應增加，無奈政府不斷政爭，南北政府朝夕動亂，各地軍閥割據，你爭我奪，干戈擾攘，使邁向民主的憲政運動橫受摧殘；益以強敵窺伺，蓄勢而發，與軍閥政客相互勾攀，民命國脈飽受威脅，國勢危殆，民生塗炭，（註13）。故在如此混亂而複雜之時代背景下，實難有利於體育的發展。

周雲錦於「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觀」一文中指出，新文化運動為一文化、政治、社會運動的總合，並促使中國現代化而達於國家獨立，個人解放和公義社會建立之目的。新文化運動的特徵，應由兩個基本論點來探討：

（一）五四時代產生了激烈的反傳統思想，造成對中國傳統社會與文

化全面而整體的反抗運動。

(二) 在此運動影響之下，產生了對西方文化過份崇拜的特殊態度。

所以我們檢討「五四」新文化，應建立正確的認識，更要以開放的心靈去思索：

(一) 對中國傳統文化做深切的了解，而非教條式的認識。

(二) 熟讀西方傳統重要經典，以深刻明瞭西方文化的精神及其複雜性（註14）。鑑於上述可知，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我國近代體育發展的重要性。

蘇雄飛於「五四運動前後我國體育的發展」一文中，指出五四運動是指學生的愛國行動，前後若干年發生的一種文化和思想運動，其宗旨在外爭領土主權、內除漢奸國賊。由此外延至反文化侵略、反政治侵略和打倒「封建思想」，因而形成的國家教育思想、實用主義、女子教育平等和收回教育權等觀念，件件使五四運動後的體育有突破的進展。梁啟超認為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缺一不可；譚嗣同強調「主動」論，且身體力行；學校體育則由兵操、普通體操和遊戲轉化為田徑、球類、武術、遊戲等；早期的教會學校雖不開體育課，但有體育組織和運動代表隊，經常舉辦校內或校際運動比賽，五四以後教育權的收回，教會學校逐漸減少；最早的體育團體由洋人建立，以推展運動競賽、舉辦運動會為主，五四以後由國人自己建立全國性體育組

織，收回體育競賽主辦權；運動競賽逐漸盛行，除校際、區域競賽、省運會、國際性賽會等，遂造成錦標主義的氾濫（註15）。

總而言之，日本影響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之起源，不只是因為所處背景雷同，明治帝國的形成，給晚清帝國起了相當大的暗示作用。尤其是留學生大批湧進日本留學，在耳濡目染之餘，不無心嚮往之，見賢思齊，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的模仿效果，加以日本儼然是辛亥革命黨人的根據地，更是晚清亡命墨客的避難所，競相發行刊物，宣傳理想，無形中巨大的輿論力量，影響國家政策取向，左右國家施政方針，自屬難免。尤其，日本辦學者的潛移默化，身教言教中，都可說是中國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的良好土壤，無不有益於中國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的滋長。

清末民初，德國正以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傲視世界，因而，從學堂設立之始，兵操教習即競相延聘德國軍人擔任，且諸多教育興革，亦莫不以德國為學習對象。事實上，近代中國軍國民教育，除吸取德國軍國主義之精神外，當時德國的教育改革，亦莫不具有啟導的作用，如德國青年公民教育的推廣及德國青年團活動等資料，我國刊物亦多所介紹，自不無取法於上的影響作用。

近代軍國民教育之興起，或在達成「富國強兵」之使命，或在實現「雪恥復國」之任務，雖然目的各異其趣，但以兵式體操或軍隊訓

練方式，養成軍國民之精神，培養軍國民之氣質，則無不同。其中，日本以蕞爾小國，因貫徹「忠君愛國」，而一戰勝中，再戰敗俄；德國受拿破侖蹂躪之後，首創舉國皆兵制，復行鐵血政策，而能雄霸世界；法國青年教育，偏重軍事，舉世無雙，而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獲勝；俄國少年軍團之軍國主義，而使斯拉夫民族之勢力日盛。當時，中國正處內憂外患，謀國者因見列強競相採行軍國民教育，且奏效宏速，感同身受之餘，受其啟導而群起效法者，自在所難免。

是以朝野人士為保衛國家主權，乃興起了近代民主主義思想（註16）。蔡元培更於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幕演說中，對教育宗旨之說明，明確的指出，軍國民主義乃應時勢需要，故採行軍國民體育。

新文化運動時期，「民主」與「科學」呼聲響徹雲霄，加上1918年歐戰結束後，主張軍國主義的德國慘敗，平民思想及實用主義抬頭，專斷的軍國民教育思想趨於衰落，單調乏味的兵式體操，難逃寞落的命運。來華傳播西洋體育的傳教士中，尤以麥克樂最為熱心提倡體育，隨後美國教育家孟祿等人，陸續到中國考察，對中國學制及課程提出改進建議，清末以來一直延用「體操」為名稱的科目，於1922年改名為「體育」，並取消課程中的兵式體操。受新文化之激盪，思想趨於開放活躍，體育方面的論著較前為多，對體育的概念見解更深入（註17）。

貳、經濟的蕭條和體育

自清末以來，中國經濟在外商控制之下，民族工業一直沒得到良好的發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列強集中精力在生產軍火，其國內一般工業產品減少，對中國的輸入也減少，因此中國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但不久一次大戰結束，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再度威脅中國，新興的民族工業又轉趨衰退。這些工商階層受到天演論的影響，知識份子所倡導的排外運動、抵制外貨運動，受到工商界密切配合，實導源於經濟因素（註18）。

以當時中國經濟情況而言，國民體育應該重平民化，貴族化的運動不適合於中國國民經濟，當時最流行的高爾夫、臺球、網球等，雖是一種有趣的運動，但並非人人有經濟能力從事這些「貴族化」的運動（註19）。

1916年以後，各地軍閥割據，截留稅收，橫徵暴斂，政府無暇顧及經建工作，經濟情況更是每況愈下。由於經濟枯竭，財政匱乏，因而政府常舉外債，以資挹注民國元年政府的用度，端恃內、外債維持。三年財政稍見充裕，但不久又逢袁世凱進行帝制，竭全國的財政以為軍備，入不敷出，年至四千萬元。帝制失敗以後，政府威權失墜，各省多不解款，遂致專賴借債支持。歐戰以後，所借最大的債，為戰後大借款（註20）。歐戰期間，各國無暇東顧，又逢南北分裂，這時

雖因歐戰爆發，我本土工業稍現生機，但戰後外國資本家捲土重來，本土工業旋即枯萎。在此經濟情況下，除教會學校體育外，政府教育經費拮据，體育經費自不殆言，故體育推展著實不易（註21）。

蔡尚思謂自「鴉片戰爭」到民國的中國，可以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代」。因備受國內封建勢力、買辦資產階級、東西各帝國主義的聯合與單獨的重重壓迫重重剝削，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均不能獨立而走上軌道。故原來的農業封建社會既無法維持下去，而新興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又無法成立起來。思想界隨著這個社會的經濟的變動，……及各國的明暗種種勢力，情況非常複雜，鬥爭非常劇烈，有的在搖動未定和轉變不已中（註22）。

然而，蔡元培二度赴歐進修返國之後，亦主張「以工作替代操練說」，認為運動無經濟利益，因此強調實際的產業勞動優於一般的體育活動。

參、社會的變遷和體育

科舉制度的廢除，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大變動。自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制度，至五四期間，政府並未制定一套有效的舉才辦法，而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愈來愈多，有理想、有能力的知識份子愈來愈多。但政治受到軍閥、政客所把持，知識份子只好在社會上其他行業發展，因其想法和做法大多超越傳統，社會上大多數人無法接納他

們。知識份子在政治和社會上都沒有希望的情況之下，不滿情緒日增（註 23）。

許光庶指出：處在「新舊」交替，中西文化衝擊最烈之時，「體育」概念未形成之際，對體育的目的與社會功能認知差異相當大。中國體育概念尚未達成共識之前，中國雖無「體育」之名，卻早已有「體育活動」之實。本土體育活動已流傳幾千年，由於文化起源與發展過程之不同，不同民族所從事之體育活動有不同的意義，這些體育活動各自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亦蘊含其文化特質（註 24）。

西洋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者，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西洋人在運動競技上最重個人之優勝。中國人的運動精神是「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注重內在的修養，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註 25）。

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社會正處在動盪不安，政治紛亂，經濟蕭條的情況，接受西洋文化是受制於強大的外在壓力，才不得不爾的處境，因此，對近代體育的吸納過程，不只不能仔細過濾篩選，甚至囫圇吞棗，以致造成消化不良（註 26）。

1915 年代，體育界一批有識之士，曾對廢科舉興新學以來中國體育之發展進行檢討。不少人感到幾十年來，中國「往往學了西國皮

毛」，而對體育缺乏詳細的研究。徐一冰曾著文說：「……學校風氣，頓變舊觀，國人既無實力預備於前，復無誠意研究於後，徒以歐風美雨，實偏至此，勢不能不隨波逐流，為之轉移。」又說：「各國之體育之體操之運動，必有各國之特長，及其風俗習慣程度之不同，未必盡合於我國人也。」他認為：「命脈所在、國性不可或忘，國情不可不知」。他甚至說：「不求其本而揣其末，雖新，亦奚以為。」社會潮流所趨，中國近代體育只能在西風東漸中載浮載沉，幾至迷失了自己應走的方向（註27）。

國粹主義的體育思想，係植根於愛國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認為「一國之國民自有他種族上、文化上的特質，這種特質，設法使他發揚而廣大之，乃是國民的天職。」（註28）。因而，認為體育課程中，不應將固有國技—武術拋之腦後，而太重外國的體育。

新文化運動興起後，馬良竭力鼓吹「國粹體育」，他編定一套「新武術」名稱為「中華新武術」，教材包括摔角、拳腳、棍術和劍術四科。他說：「考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是以決心考究我國數千年來武術，編定武術教科書，以振吾中華尚武之風。」（註29）。

如上所述，武術的再興始自西洋體育的傳入，論者所在多有（註

30)，不過，以學校教育體系刻意大力推展，則是1915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軍國民教育實施方案之後的事。在該方案中，曾分別就教授及訓練的條文，明列：「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以及「各學校應表彰歷代武士之遺像，隨時講述其功績。」（註31）1919年教育部在京召開中學校長會議，並通過：「請全國中學校一律添習武術」案，原意雖與軍國民教育不無關係，卻顯示學校體育徒以體操為主課，不如提倡中國武術，不僅可鍛鍊身體，且可養成自衛能力，意義重大。

傳統體育深受專制政體和家族觀念的影響，武術具有濃厚神秘的宗教色彩，又有自我完善和安分守己的內向性，因此抑制開拓、競爭的意向，並重視禮儀，導致對體育競賽激烈對抗的排斥，開展較具娛樂功能的競藝項目，運動技術和運動成績較不被重視（註32）。西洋體育本身具有外向性、競技性和規範性，活動推展上較易迅速發展，本土體育受到西洋體育的挑戰後，漸漸走向競技性和規範性的方向。除國術組織、國術考試走向規範性外，國術的推展也走向競技性和規範性的傳播方式（註33）。

王庚更介紹幾種有價值的固有運動法，請同好共同提倡，如五禽之戲、拳術與技擊、射禦、舞蹈、鞞韃、拔河等。他認為國術應當提倡，但國粹體育如此繁雜，當然不是都有提倡的價值。並且有許多方法，仍然是數百年前或數千年前的方法，其中並沒有加以改良，或者

在現在的社會，已毫無用處了。因此，提倡國粹體育，材料上應注意選擇，並提出三個觀點：

(一) 提倡合於科學的國粹體育：

所謂「科學的」即指合於衛生之法則，與生理上不相違背的。我國有許多不合生理衛生的體育方法，如拳術中拼命以足踵落地，以顯大力；又謂練功者早晨不可小便，這都是非科學的。又對於運動量也宜特別注意，那幾種合於女子練習的。還有心理上也應注意，北方人有合於北方人的方法，南方人有合於南方人的運動法。若不合於科學的，不能盲目的提倡，要提倡須加以切實和高深的研究，再加以改良。

(二) 提倡活潑的國粹的體育：

養成健全的體格與活潑的精神生活的應用，是體育中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呆板的，沒有生氣的，便不能提倡，我國體育法中如靜坐之類，可完全代表死的體育，還有幾種方法，是專門用大力而動作極慢，如舉千斤石之類，這種運動的結果，是使人的肌肉發硬。力量是大了，但是應用不變，成為一個呆人。

(三) 多提倡有生活遷移的國粹體育：

如拳術可以養成人有大力，將來可以擔任重大而辛苦的事業。有多種國粹體育與現代生活，簡直毫無關係，如「投壺」之類，技擊中

的刀槍之類，在生活上雖沒有多大的應用，但可養成人之膽量及勇敢等，在教育上有相當之位置，亦值得提倡（註34）。

此時，社會輿論亦多力倡軍國民教育，其中，或主張欲謀國之強盛，必使人人有軍國民的資格，認為中國欲自強「非全國皆兵，人自為戰，無能濟者」揭櫫處民族競爭之世，必須鼓舞國民獨立精神，認為自今日即提斯精神，操練體魄，猶可以自救；或分析世界大勢與教育方針，力主教育應謀體育、德育、智育之調和，並使舉國團結一致，對外競爭（註35）。

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向參議院宣佈新教育之主張時，亦坦然力陳「軍國主義為體育……兵式體操，軍國主義也」（註36），足見在歷史的條件下，當時社會中的體育觀念，與兵式體操並無二致。

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對社會體育的影響，較重要者，可歸納為：女子體育的提倡及體育會的相繼成立。前者為人人皆兵，提供強種強兵的基礎；後者則是寓軍於民，重在化軍事鍛鍊於平時體育活動中，講求其實效。女子體育的提倡，當然受女學之興的啟發，而有相當明顯的起步。但是，自強保種的自覺，使得女子體育頓受重視，應是主要原因，實不過言。梁啟超認為：「……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

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詳，進愚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夫，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註 37）。

肆、教育宗旨和體育

1902 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學堂章程」，第二年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它確立清末民初三段七級的「癸卯學制」（註 38）。按該章程規定，各級各類學堂均應將體操科列為必修課程，小學每週三小時，中學師範和實業學堂每週二小時，高等學堂每週三小時，體操課內容均以兵式體操為主，普通體操為輔（註 39）。它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正式頒行全國的重要法令，同時確定了體育在我國教育中的地位，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民國成立，國體更新，清末教育宗旨自不適用。1912 年（民國元年 1 月 1 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首任教育總長。他在 2 月發表「新教育意見」一文，其中提出五項教育主張：

- （一）為「軍國民教育」。
- （二）為「實利主義教育」。
- （三）為「公民道德教育」。

(四) 為「世界觀教育」。

(五) 為「美感教育」。

九月教育部本蔡氏的主張，公布新的「教育宗旨」為：

「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註 40)。

1912 年教育部頒布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註 41)。可見當時體育課仍以兵式體操為主體。惟在高等小學校已不強調兵操，而僅規定加授兵操，並規定在體操課內或課外，可根據地方情況加授戶外運動或游泳。

1915 年，袁世凱欲稱帝，乃於 1 月 20 日以大總統名義頒布「教育綱要」，對於民元所定教育宗旨，重加闡明，規定經緯體用，並標明實用主義。其申明原文如下：

「申明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實利、尚武、並運之以實用，以命令頒佈」。其說明中說：

「現時教育最大之缺點有四：(一) 不重道德，(二) 不重實利，(三) 無尚武精神，(四) 不切實用。教育部前頒宗旨，注重道德、實利、軍國民、美感各教育，惟未標明實用主義。且部令雖頒，國內並未奉行，教育迄今無一定向。是宜重加規定，以道德教育為經，以實利教育、尚武教育為緯；以道德、實利、尚武教育為體，以實用主

義為用（註42）。

1915年2月袁世凱根據「教育綱要」正式頒定教育宗旨為：「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註43）。

袁世凱所定的教育宗旨，前四項內容和前清欽定教育宗旨相似。重自治一項雖為當時的新觀念，但窺其用意，則在標榜立憲之名，以欺矇國人的耳目。而最後兩項雖係針對他所謂的反對黨而發，但其帝制自為的野心卻欲蓋彌彰。1916年（民國5年）7月，袁世凱帝制失敗，九月國務院議決撤銷前頒的教育綱要，因此，根據綱要而定的教育宗旨也隨同廢止（註44）。

當時雖軍國民主義盛行，影響所及，政府教育當局亦提倡軍國民教育，兵式體操是學校體育課程的主要內容，但仍有很多知識份子，指出兵式體操之弊病，對體育的意義、本質、價值、功能提出論述（註45）。

伍、文化的輸入和體育

就文化觀念言，如眾所週知，中國文化素以儒家思想為主流，並以孔子為其宗師，孟子、荀子為大宗。近代以還面對西洋文化蜂湧而至的衝擊時，強烈的保守色彩，於焉浮現；並產生了國可亡文化不可滅的文化主義觀念，對後世歷史造成諸多影響，自是不言可喻。

鴉片戰爭後，中國人的「天朝」思想逐漸被打破，思想上由保守

優秀的文化傳統轉化為自卑抗拒的心態，行動上由被動學習轉變成主動學習，文化傳播層次上由器用文化的適應，到政治制度的改革以應變，進而思想觀念的突破以應時（註46）。

外國文化的輸入，其對體育的影響莫過於在新式學堂設「體操」，為我國學校教育出現體育之始，開啟近代體操運動在我國的傳播。另派遣留學生赴外，與聘洋教習引入兵操，更加速了西方近代體育的提倡與傳播，並導致軍國民教育體育思想的萌芽。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氣氛中，知識份子反對迷信不遺餘力。陳獨秀、胡適等都作過最嚴厲的批評，陳獨秀認為信仰必須基於事實與理性，無論是宗教、政治、倫理和其他無稽的信仰都是偶像，都應該毀滅，才能使人相信真理。陳獨秀宣揚唯物主義，胡適倡導實驗主義，錢玄同闡揚懷疑主義，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以及來華講學的杜威和羅素都持反宗教的態度，使當時知識青年對宗教大表懷疑。羅素認為當時中國青年既揚棄了土迷信，所以不會再接受外國進步人士所揚棄的洋迷信（註47）。

中國近代文化論爭的演進，是由洋務運動器物層次的改革，進入政治秩序的激烈變革以求存，再進而傳統價值的改造。近代中國文化的變遷，受制於西方列強外力壓迫之因素，非出自於主動的學習；加上中國文化的保守性與優越感，對學習西洋文化始終停留在「皮毛西

化」的階段，且在僵化的禮教制度下，在新、舊過渡時期，產生中西文化排拒、吸收過程兩極化之傾向，對中國文化融合與創造產生阻礙作用（註48）。

西洋近代體育的傳進，除靠西方傳教士藉傳教之媒介外，荷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屢次遣派使節到中國來，要求訂約通商。中英歷經「鴉片戰爭」後，訂定南京條約，除割地賠款外，中國被迫增開口岸對外通商。1858年天津條約開放長江流域；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訂立北京條約，開放天津為商埠；1895年中日戰爭，訂立馬關條約，開放內地四口通商。從此西方文化與經濟勢力大量擁入中國（註49）。外商除經濟利益外，原具有西方色彩的生活方式與體育活動，無形中也融入中國社會，致使我國各大城市很快的受西洋體育文化的影響。

從文化的觀點看西洋體育的傳入，兵式體操首先傳入中國，其目的在自衛衛國，甚且強國強種，使國人始終將體育定位在強國強種，並且「中國體育」首習德、日體操，後改英、美體制，在東施效顰後，對體育的觀念更混淆，因而展開一場長久的洋土體育論戰（註50）。

西洋體育的傳入，首先因由基督教青年會和教會學校的傳播與推展，早期的運動會都委由外國人辦理，但自1920年代初期的反基督教運動的影響，更由於遠東運動會失敗的刺激，隨著中華全國體育協

進會的成立，體育權由外國人之手中收回，西洋體育完全由中國人推展，但從事體育活動人士，對體育的目的仍是一知半解，以致產生西洋體育推展上的缺失，有些學校為爭取校譽，將學校大部分經費用於選手身上，養成選手驕縱的態度，運動選手不必注意功課，每日僅管練習，比賽時獲取錦標為目的，亦有少部分選手因運動傷亡，亦有所聞。當時環境困苦，經濟拮据，學校的體育經費被少數運動選手挪用，造成「貴族式」的體育，一般學生因無設備可用，使西洋體育受到更多的批評。

陸、教會學校的蓬勃發展和體育

教育權的喪失，始於對基督教傳教的保護。原來，1858年，中英天津和約第八款明訂：「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者，一體保護；其安分無過，中國官毫不得禁阻。」此例一開，各國競相要求援例，因此，或設青年會，或辦教會學校。事實上，這些單位，除宣傳教義外，並作為文化侵略之據點。尤其，甲午戰爭後，日人在南滿設立殖民學校，1915年後復在青島及膠濟路一帶設立日式學校，教育華人，旨在推動其殖民教育政策（註51），至為顯然。

清末傳教士可在中國自由傳教。1840年後，教會學校漸增。到1875年左右，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教會學校已約有800所，學生近

二萬人。到 19 世紀末發展到近兩千所，學生四萬名左右（註 52）。

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之正式組織，早在 1885 年福州的英華書院和通州的潞河書院先後成立青年會，是為肇端。1908 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始設體育部。青年會全國協會除體育部外，還設立學生部和幹事養成部等七個部。在青年會內，體育部除開展日常工作，還必須與其他各部協同，處理有關的事務。其他各部同樣也有推廣體育的義務，如幹事養成部不僅培訓能夠料理一般事務的幹事，而且培訓專門的體育幹事；學生部也要兼管各學校聯合組織運動競賽等事務。因此，從推廣體育來說，青年會是一個整體，而體育部只是其中一個重要部門（註 53）。

早期教會學校對西洋體育在中國的傳播發揮重要的影響，由於教會學校開展體育較早，開風氣之先。且教會學校的運動較優，在運動競賽中常有某些倡導、示範、觀摩等作用。教會學校體育在傳播西洋體育佔有重要位置，藉體育活動達到文化交流效果，展現西洋文化的不同風貌，並提高教會學校聲譽，因而西方體育重勝利的功利色彩，也一併帶進中國。這種優勝劣敗的「選手制」和「錦標主義」形勢，對 20 年代後的中國近代體育產生嚴重的弊病（註 54）。

另英、美各教派在中國設立不少的學校，如英國人創辦漢口博學書院（1895 年）、天津新學書院（1900 年）、香港大學（1910 年）。

美國人設有武昌文華大學（1901年）、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年）、蘇州東吳大學（1901年）、北京清華大學（1912年）等。此外，尚有英、美合辦的北京匯文書院（1885年）、南京金陵大學（1912年）、山東齊魯大學（1904年）、法國人創辦的震旦大學等等。這些大學和書院，一般都附設中、小學（註55）。

早期教會學校雖未開設體育課，但卻有體育組織及運動代表隊，固定的運動場地，並較早開展田徑、球類等運動，北京、上海的教會學校更是體育運動競賽的創辦者，更值得稱道的是，中國參加前幾屆遠東運動會的代表，泰半選自教會學校，早期青年會之外國體育幹事及教會學校之外國教員，實為推動我國近代體育之主幹，在中國近代體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註56）。

教會學校在中國近代體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尤以基督教青年會，更是活躍。尤其是麥克樂的推展，其思想係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美國自然體育思潮，尤其是：

（一）在人性方面，強調身心一元論、本能的活動。

（二）在體育目標方面，著重體育與教育的關係，人格發展及民主概念的培養。

（三）在課程設計方面，主張課程內容、教學法及測量為重點。

此論對我國近代體育影響深遠（註57）。

王建台在「麥克樂 (McCloy) 對中國近代體育的影響」一書中，歸結當時中國體育之狀況如下：

(一) 民國肇建，內憂外患，逮至民國 15 年，軍閥割據，永無寧日，政府自顧不暇，遑論體育。

(二) 經濟窘困，財政虧空，泰半耗費軍需，運動場地，設備、器材嚴重不足，體育無從施展。

(三) 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家庭和學校配合意願低落，影響選手選訓和參賽成績。

(四) 缺乏強而有力的體育領導機構，並乏制度且體育專業人員非但素質低落又不足，社經地位自不殆言。

(五) 體育運動未能普及，競技選手全仰賴在校學生，稍有成績則驕態自滿，不求上進和突破。

總之，中國參加歷屆遠運會，成效不彰，肇因於本身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因素，無從歸罪他國或他人之理，至為明顯（註 58）。

綜合本節在探討當時蔡元培對我國體育推展之時代背景方面，約可簡略歸納為：

一、在時間方面：

內部政局動盪不安，外部列強侵略，因受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潮的影響，致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勃興。此時的體育常因國家情勢及社會

環境的困限，常扮演不同角色與任務，也造成體育概念與目標的模糊不清。

二、在經濟方面：

受到外商的控制，及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影響，外加內因軍閥割據，橫徵暴斂，政府無暇顧及經濟發展，靠借貸度日。在此情況下，體育推展之不張自不殆言。

三、在社會變遷方面：

當時正處在「新舊」時代交替，中西文化衝擊最激烈的時候，對體育的目的與社會功能之認知頗有差異，對於外來體育之吸納過程，也有消化不良之現象，但也激起了對國粹體育的重視與反思。

四、在教育宗旨方面：

清末癸卯學制確立了體育在我國教育中的地位，民初政府本於蔡元培的主張，公布了內含以德育為基礎的軍國民教育體育與美感教育體育。後袁世凱亦定有教育宗旨，然其變動委實不大，且時效不長，反而一些知識份子指出兵式體操之弊病，對於體育的意義、本質等多有提論。

五、在文化輸入方面：

中國固有文化在清末民初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產生了重大的變化，適時體育初現於我國學校，加速了西方近代體育的提倡與傳播。

六、在教會學校蓬勃發展方面：

因清末外國傳教士可自由傳教，教會學校迅速發展，教會學校發揮了西洋體育在中國的傳播功能，雖具藉由體育活動達到文化交流之效，但也將西方體育的功利色彩感染了中國，使其弊病遺留至今。

第二節 蔡元培對我國近代學校體育的推展

本研究於蔡元培對我國近代體育的推展一節中，探討其體育理念的推展、體育教育目標的擬定，以及對學校體育的推展，逐項分析說明如下：

壹、蔡元培的體育理念

鴉片戰爭以前，我國嚴辨華夷之分，堅守閉關之局，不願和列強往返。清末外患日亟，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之役、八國聯軍之役等接踵而至，我國在軍事上節節失利，迫訂城下之盟，割地賠款，於是我國由閉關自守的國家，一變而為門戶洞開的國家，不惟不能不和列強交往，而列強的勢力漸次深入中國境內，將瀕於瓜分亡國的邊緣，於是有識之士紛紛提出救國大計，如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經洋務運動對西方堅船利砲的追求等(註 59)，其目的均在救亡圖存，